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THE OBSERVER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　第十三期

專論
政治失常　儲安平
經濟學人與經濟方案　徐毓枬
從四種觀點論美蘇兩國的經濟平等　吳景超
倫敦通信
英國整軍及其影響　朱若華
外論選譯
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　世界八專家
觀察通信
大局的搶救　觀察特約記者
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在牢獄中（文藝）　昶明

政治失常

儲安平

最近政府有幾件事情做得實在不成體統。第一件我們要說的當然是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通過的「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政府在八一九發行金圓券時，規定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四元，這次的修正辦法改爲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二十元，將金圓券貶値了五分之四。政府在發行金圓券時，大唱其「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調子，並且說誰破壞了金圓券，誰就是國家民族的敵人！現在，我們看，政府自己率先破壞了金圓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國家民族的敵人！當十月杪十一月初全國騷動得不成樣子的時候，當局宣佈卽將有「更好」的辦法頒佈，所謂「更好」的辦法，大概就是這個金圓券發行的修正辦法了，其中決定將民間繳兌的金鈔吐還出來，以便取之於民者，仍用之於民。然而吃進去的時候，黃金一兩祇兌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祇兌金圓券四元，現在吐出來時，黃金一兩却要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圓券二十元，一「取」一「用」之間，賺上了五倍，這筆沒本錢的買賣眞不壞。抗戰末期，政府財政困難，宣傳黃金儲蓄，說得天花亂墜，可是到眞要支付黃金時，却來了一個六折，憑空扣去四成；這事大家當還記得。現在舊戲新編，又要一手。多年以來，政府把人民當着一團米粉，捏在手裏，要圓就圓，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虧，心裏恨透，可是沒有辦法。再說八一九政府的經改辦法，規定人民所存金銀外幣，一律須向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逾限而未兌者，卽視爲觸犯刑法，現在又允許人民持有金鈔，並將金鈔的價值，提升五倍，以前服從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從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這種行爲，一方面自己打自已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後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實也一再證明：相信政府的最初總是給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後就給政府扔下不理會了。修正辦法第十一條又說：「凡以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指定之銀行，存期滿一年者，除照章計息外，並得於存款時以與存款同額之金圓券向存款銀行兌換金圓。在金圓未鑄成前，得按規定比率兌取黃金或銀幣。……」一年之後的情形如何，誰都不敢說定，而一年以後的金圓券貶値到什麼地步，尤其不能想像，假如今天眞還有人到中央銀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爲白癡無疑。所以這條條文，撕破了臉皮來說，就等於要化兩千元金圓才能兌到一兩黃金；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眞是算盤精極！

第二件我們要說的是翁文灝內閣的辭職問題。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十一月三日寫了一篇論翁閣辭職的文章，可是四日中英文日夜報一律報導，翁氏堅辭，並已不到政院辦公，翁閣的總辭書也已全體簽字，卽將送府，翁閣之辭，似成定論，深恐文章刊出時，已成馬後礮，所以在付印前數小時又臨時抽了出來。不料我的文章剛抽了出來，翁氏却又回行政院去辦公了。這次經改失敗，翁氏的責任無可推諉。眞正的來說，這個大責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負之（財政部部長當然有責任，但財政部隸屬於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敗，行政院院長的責任還大於部長的責任，故此處不獨立論財長的責任），有欠公道，因爲拆穿了說，翁也不過是一個賬房先生，既不是當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憲法的原則言，這件事總是要翁負責的。所以從政治的責任言，翁的一辭二辭三辭堅辭，都對。問題是他雖堅辭而當時竟未能堅辭到底。這次經改的失敗，其性質不可謂不嚴重，其影響不可謂不廣遠，無論就個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責任言，翁氏絕無繼續負責的可能。嚴格言之，就是十月卅一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有關經改的補充辦法一事，亦屬不當。內閣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執行的政策的成敗，政策既敗，內閣卽垮。八一九的經改辦法，政府亦已自承失敗，在此種情形下，行政院應當立刻呈辭，任何補充或修改的辦法，都應由後任來決策辦理。當翁氏上台之初，胡適之先生捧場，謂翁氏有勇氣。我覺得當時翁氏並不是有勇氣接受那個閣揆大任，他祇是沒有勇氣拒絕總統這個組閣大命吧了。翁氏既無勇氣拒絕任命於前，亦無勇氣堅決呈辭於後。不錯，當前的局勢是危急的，政務不宜一日無人主持，但是從憲法原則來說，這個責任是屬於總統的，而非屬於行政院院長的。易言之，時局既然緊急，總統便應早日另定閣揆之選，已經呈辭亦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長，不能因爲總統的遲疑不決而勉力維持下去。至於總統先生，行政院院長既然有這樣嚴重的政治責任，其辭呈應無不批准之理；因爲假如這樣一個有重大政治過失的行政院院長，還不使之去職，則所謂「政治責任」也者，豈不成了好聽的空話？翁氏一辭再辭，總統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總統對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對僚屬氣度之厚，假若一味堅留，則既破壞憲政的原則，亦置綱紀於不顧，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都是不當的。

第三件我要批評，而爲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賦予傅作義的權力的問題。按照報上的記載，要點有二：一、以後華北軍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權處理，不須事前請示中央；二、

假如傅氏所頒佈的法令與中央所頒佈的法令有牴觸者，以傅氏所頒佈的法令為準。凡此記載，雖未見之正式公報，但也未見政府有何否認更正，想為事實。這個問題十分嚴重。舉例言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議，不得變更之」。現在假如傅氏要變更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土，則中央是否承認傅氏之變更為合法？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假如傅氏所頒佈的法令，有與憲法牴觸者，則是否仍以傅氏所頒佈者為準？凡此都是大有問題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許不成立，因為祇說傅氏的法令與中央的法令牴觸者，以傅氏的法令為準，並未說到與「憲法」牴觸的情形，如與憲法牴觸者，自然無效。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憲法第一百十六條明明規定：「省法規與國家法律牴觸者無效」，第一百十七條說：「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明白規定地方法令不能與中央法令牴觸，牴觸者無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張傅氏的法令如與中央的法令牴觸者，應以傅氏的法令為準，這種事情完全是違憲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規與中央法律牴觸發生疑義時，應由司法院解釋之，現在假如硬性承認傅氏法令與中央法令牴觸時，即以傅氏法令為主，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違憲的。

大局越來越緊，各種現象日見失常，但失常也有一個失常的限度，當權者雖然希望保持他們的政權，但政治的常規則究竟不能不「永矢咸遵」。上述三事，都是犖犖大者，實際上，近來當局各種措置，大都有失體統。我們平日的職司，就是議論政事，然而處此危局，幾乎無政可論，無政足論；仰望長空，廢筆三嘆！

經濟學人與經濟方案

徐毓枬

幣制改革以後，第一個月物價還相當穩定。從九月下旬起，物價開始跳躍，繼則演成搶購情形，再演為無市不「黑」，祇有在「黑市」纔能買到東西，或甚至於在黑市也不容易買到。民不聊生，人心惶惶，許多人覺得這種局面不應當讓它繼續下去，應該想一個辦法；許多人更把目光投射到經濟學人身上，認為他們應該可以利用其專門知識，擬出一套辦法來。但是事實上除了極少數極少數例外，經濟學人異常沉默，拿不出什麼好方案。在學人們自己私人談話之間，大概也是搖頭嘆息的時候多，自己覺得有把握挽救時弊的時候少。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一般學人們專門知識不足，想不出一個辦法？或者傳統的經濟學根本不適於處理這種非常時期的經濟問題？或是還有其他原因？筆者專門興趣亦在經濟學一方面，想以（忝為）經濟學人一份子之立場，向一般人解釋：為什麼經濟學家想不出什麼好辦法。

一　有一部份學人基於政治理由，根本不肯想辦法

在現在這個時候，幾乎任何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政治的含義，不過有人明白意識到，有人不明白意識到而已。有一部份經濟學人的政治意識很強，他們有種種理由，不喜歡現政權繼續維持下去；他們很明白，凡是幫助政府解決經濟困難者，不論有意無意，都是幫助鞏固現政權者，因此他們祇在經濟紊亂之中，等待或迎接光明之來臨。

這些經濟學人也知道，在經濟紊亂之中，許多人生活或不能維持，或痛苦不堪，但是他們從現政權無可救藥一定要斷裂——這個前提出發，認為長痛不如短痛。在短短的痛苦過程中，當然有一部份人要受犧牲，但是在長的痛苦過程中，被犧牲的人更多。這一點痛苦好比是女人生育時之痛苦，要創造新生命，新時代，這一點痛苦是必須付的代價。寧可讓痛苦程度劇烈一些，可是不要讓痛苦時間加長，因為時間一拖長，母體怕受不住；等到光明的新時代來臨時，享受這新時代的人，却已失去了享受能力。

上面說過，本文目的在解釋，價值判斷則讓讀者自己去下。我們要在這裏指出的是：這亦不失為一種態度，如果有此態度，當然不願意為目前經濟失常現象想任何辦法。

二　有一部份學人對物資前途悲觀，認為什麼辦法都不好

另有一部份學人，他們的政治意識或者並不強，或者認為在戰事過程中，應該想想辦法，想讓不直接參加作戰者生活得下去。可是在這批人之間，又因為目前物資情形是否足以支持這樣一個大規模戰事，而意見分歧。經濟學人都知道，戰爭是物資之大量消耗，而消耗之最高限度，乃等於全國本年產量加國外借款，減去維持本國人民最低限度生活水準，所必需的物資。如果戰爭之物資消耗量，超過這個限度，人民將無法維持生活，後方先將發生動搖，戰事無法再繼續。目前全國物資情形究竟如何，是一個統計資料問題。這些資料既非人人可得，不妨作一些臆測。連年戰事，適齡壯丁大都來自田間，抗戰後期有些村落，簡直看不見壯丁，農事大都由老弱婦女充任，這種現象大概對於生產量有不利影響，此其一。政府有效控制區域，日漸縮小。有大批餘糧可供他區消費之地區（如東北）已不在政府控制範圍，全國主要產麥地區，亦因華北戰局之節節失利，而逐漸喪失，此其二。在以前抗戰時期，地域雖淪入敵手，但因敵人祇控制一些點面，淪陷區物資尚能滲入自由區，今日則地域一入共軍之手，物資即不再外流，此其三。即使江南尚有大批餘糧，可供華北幾個孤立據點之用，全國運輸能力，是否能夠把充足的糧食，準時運達指定地點，尚有疑問。長春在圍城時期糧食情形之嚴重，目前平津配糧之不能準時發售，都是說明本點，此其四。如果全國大都市都要靠外國糧食來維持，則即可撇開外匯問題不談，富庶如美國是否有此能力負担，亦成疑問。京滬平津穗青這幾個都市，人口就在一千萬以上，約為英國人口四分之一強，約為美國人口十二分之一，美國是否有此餘糧，可以供應偌大人口，同時滿足她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契約義務，是很有問題的，此其五。

基於以上五點，故懷疑目前物資情形是否足以支持如此大規模戰事者，除非有決定性的統計資料，可以證明其每一點都站不住，否則他們的論證即告成立。如果他們的論證可以成立，則一切經濟方案還有什麼用？一切經濟方案至多是使財政收支平衡，物價

確定。但如果物資情形，使得戰事與生存不並立。則經濟方案不是魔術，更不是神蹟，不能無中生有，變出物資來。一切不能使大衆生存下去的方案，是大可不必想的。

三　還有，邏輯的解決法不就是切實的解決法

卽使有些經濟學家，衝破以上兩道難關：他的政治意識不強，或者他是同情（有意或無意）現政府者，他又認爲物資情形不嚴重，或雖嚴重而尙有克服可能，可是這些經濟學者還有些躊躇不前，不敢或不肯提出具體方案。因爲他們明瞭，邏輯的解決法不就是切實的解決法（logicarvs. practical solutions）。

要說明邏輯的解決法與切實的解決法之區別，最好舉幾個例。如果有人說，要解決某地的糧食問題，我們不妨學梁惠王的辦法，「河東饑則移之於河西」，如果有人作此主張，大家一定要竊笑，因爲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每個人對他久居之處，都有情感上的業務上的聯繫，不能驟然分割，而且每人都多少有些家累，不能說走就走。而且扶老攜幼，如何走法，徒步幾乎不可能，要用交通工具則何來如許大量交通工具？然而我們要明白，在邏輯上說，這未始不是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我們笑的不是這種種想法之邏輯，而是這種想法之不切實際。

我認爲幣制改革之未能成功，其主要原因，卽在沒有辨別邏輯性與切實性。當時政府當局根據何種思維，要實行改革，執政者從來沒有明白說過，我們無從明確知道。一種可能的邏輯大致如下：法幣之所以如此貶值，是因爲行使日久，人民已經失去心理上的信仰；如果幣制改革，則心理上大概可以改觀；如果心理上改觀，則二億金圓券（收兌舊法幣之數）必不夠流通之需，故大可增發；卽使增發至戰前水準（十四億），物價亦不致於大漲，因爲折成戰前法幣，十四億僅抵戰前發行額之半；如果可以增發如此之多，而物價不受影響，則財政收支可以平衡幾個月；如果可以平衡幾個月，則在此幾個月內，可以想想財政上更根本的辦法，於是財政踏上正常之路。從邏輯可能性而論，每一個命題都不僞，可惜事實上出現的並不是預期的可能性，而是另外一種可能性。人民心理上固然暫時改觀一下，可是因爲已經有十年教訓，很快便以對待舊法幣的態度，對待金圓券，於是以下命題都隨之而不能成立。

以上舉例前一例最明顯，使人一望而知邏輯性與切實性不同；後一例屬於事後診斷，事實具在，無容置疑。筆者舉這兩個例，其興趣不在這兩個例子之本身，而在作爲一種一般的警告，不要把邏輯性與切實性混爲一談，對一切所謂經濟方案，須以批判的態度，審愼考察。

常人每震於（impressed by）學人們所擬方案之邏輯性，覺得他們說得頭頭是道，無懈可擊，於是誤認爲這便是一種切實的方案。如果有這種聯想，那是錯誤的。邏輯一事，凡是受過嚴格思想訓練的人，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問題祇是：這些邏輯推論所根據的前提是否站得住？擬議人對於各種有關因素之價値判斷，是否近乎人情？而擬議人對於這些問題，往往不明說，祇作暗中假定，因此更增加常人了解之困難。試以物價指數債券爲例，擬議初起時，雖然有人懷疑，但對於該種證券理論上的懷疑，現在都巳沉默，以前懷疑甚強者，現在亦巳變爲信徒。但我認爲，我們可以相信一種方案之邏輯性，可以不必同時相信其切實性，我對於物價指數債券卽作如此感。指數債券不過舉例而巳，其他方案亦可以同樣態度觀之。

在離開本節之前，我必須得強調「機構問題」，使我最感大惑不解者，是一方面詆毀政府貪污無能，而在另一方面，在方案之中，却又常常說政府應該做這樣，做那樣。我常常懷疑，如果政府眞有做這樣做那樣的機構，事情還會如此之糟嗎？這無異是對一個天資拙劣的兒童說，如果你要在學校裏面功課好，你應該天資聰明些。這句話之沒有意義，很顯而易見。這裏不禁令人想到全面配給問題。我對於「全面」什麽，「統籌」什麽，一向存着懷疑態度，流弊所及，往往限於機構，包而不辦。英國能夠實行良好的全面配給，因爲英國食糧之五分之四來自海外，糧源容易控制；英國行政機構之有效以及免於貪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而我們呢？以平津二市而論，公敎人員九月份以後的每人一袋麵粉，迄今尙未發下；而十月份全體市民可得的每人十五斤麵粉，迄今尙祇能發第一期三分之一。如果我是一個老實守法的公民，我能高枕無憂，信賴政府能夠按時把食糧配下，使我免於斷炊之威脅，而無需向黑市去搶購食糧嗎？如果主要配給品該到而未到，這在人民心理上，將發生多大惡劣影響？政府在維持配粉方面所遇的主要困難，似乎是糧源以及運輸工具二者。我們要注意，每人每月十五斤並不足夠一個正常人之需要。如果維持小規模的配粉，都巳感覺困難，則維持更大規模的全面配給制度，其困難又如何？在沒有確切把握之前，最好不侈談好聽名詞，以免又是一張空頭支票，再失信於人民。

四　經過以上三重考驗以後，還有一重難關：時效問題

如果有人政治意識方面不發生問題，認爲物資情形也還過得去，認爲自已擬的方案，旣在邏輯上無可非議，而且深切實際，無難行之處，他是否有充分自信心，把這方案公諸於世，要求政府採納呢！未必。因爲還有時效問題，恐怕太晚了些。

我這裏毫不涉及軍事情勢，我祇從方案本身立論。如果在政府沒有幾次自毀債信之先，發行物價指數債券，那時人民之趨向這種投資對象，也許不亞於購買黃金儲蓄券，可是在今日發行這種債券。其成效也許類乎國營事業（中紡、招商局、台糖等）股票。這些股票背後，的確有眞實可靠的資產，而且未必個個人都想控制一種企業，故對一般人而論，國營事業股票應該是最理想的保持幣値工具，何以問津者不踴躍呢？又如封凍游資等，如果要發生效力，最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辦法，一下子實行，現在學人們呼籲巳經一年多了，聰明的有關人員也許巳存戒心。正好像徵用國人在外資產，議未行而嚷嚷甚久，恰好給豪門們充份時間，安心準備，設法逃避。又如在國外購糧在國內拋售這個辦法，現在效力也小，因爲在一年多以前，這個辦法之解決食糧有無問題之意義小，過制通貨膨脹之意義大，今則情況相反，解決食糧有無問題之意義大，過制通貨膨脹祇是副作用而巳。上面說過，如果許多大都市之食糧都要靠國外，事實上恐不可能。而且，拋糧而要收平抑物價之效，政府必須有相當豐富的庫存，以後來源又要源源不絕，以往拋售政策之未能奏效，主要是因爲存底稀薄，拋了極短一個時期便無以爲繼，因此反而增加市場恐慌心理。現在撇開外匯來源問題不談，單就積聚這樣一筆存糧（例如足數幾大都市三至六月之用），就要花多少時間？因爲以上種種理由，故在現在提出經濟方案，大概祇是盡其在我而巳。

五　結尾

我寫本文之目的，祇在說明：爲什麽經濟情況嚴重到如此地步，而經濟方案反而害

少。如果我的分析不錯，如果國內經濟學家對政治、物資、可行性、時效這四點之看法，意見一半一半，則現在可以從事於擬製經濟方案者，祇是國內經濟學家之十六分之一。而在這十六分之一之中，意見還可能不同，着重點還可能不同。

還有，悲觀與否是實際執政者之態度，不是科學家之領域。如果是執政者，當然應該抱「有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的想法。如果祇想混，不想更徹底的辦法，當然是愈來愈混不下去。

從四種觀點論美蘇兩國的經濟平等

吳景超

「經濟平等」一詞，含義甚多，我們很難找到一個為大衆都能接受的定義。現在談經濟平等的人，各人對於這個名詞，有各人的用法。現在我們採用幾種不同的定義，也就是從幾個不同的觀點，來看美蘇兩國中經濟平等的實際狀態。

一

經濟平等的第一個意義，就是各人所得的來源是一樣的。在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中，私有財產的制度取消了，人民的所得，照理只有一個來源，便是勞務的收入。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各人的勞務所得，有多寡之不同，但無害於經濟的平等。這是正統派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平等的看法。恩格斯曾說過：「無產階級平等要求底實在內容，就是要消滅階級。任何超過這一範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會得出荒謬結論來的。」列寧解釋這一句話說：「恩格斯寫得千眞萬確，平等概念除消滅階級而外，就是最荒謬的一竅不通的偏見。」遵照這種解釋，一個國內，如有一部份人靠勞務的收入維持生活，另外還有一部份人，靠財產的收入維持生活，那就是表現階級的存在，也就是表現着經濟的不平等。反是，不工作的不許吃飯，大家都靠勞務的收入來維持生活，那就是表現階級已經取消，也就是表現着經濟的平等。

如以這個定義來衡量美蘇兩國，那麼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是不平等的，但美國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超過蘇聯。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全國的收益，有一部份為勞務的收入，另外一部份則為財產的收入，所以從上面的定義去觀察，美國是一個有階級的國家，也就是一個經濟不平等的國家。研究美國經濟的人，都很願意知道，在美國的全國收益中，有幾成是勞務的收入，又有幾成是財產的收入。這兩種收入，在過去幾十年內，變動的經過如何。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其所以不容易回答，就是因為美國的公私統計，凡是討論全國收益的，都不是採用二分法（即將全國收益分為勞務收入與財產收入），而是採用三分法。三分法的內容，一為被僱者的收入，這是勞務收入，不成問題。二為公司利潤及存貨調整，此為財產收入，亦不成問題。只有第三項目，包括經營者及地租的收入，不易處理。地租收入，可以歸於財產收入一項之內。只是經營者的收入，包括一切非公司組織的事業單位的收入，如農業、商業、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其中到底那一部份是財產收入，那一部份是營務收入，是不易分別的。譬如美國中部的一個農民，擁有田地一百七十英畝，自已一人利用曳引機來耕種，年終收入五千元。這五千元是勞務收入呢，還是財產收入呢？還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關於美國的全國收益，我們雖然不能採用二分法，但是過去各階級中收入的演變，也有幾點可說。第一，被僱者的收入，在一九四七年，佔全國收益的百分之五九點九，較之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五五點九，顯有改善。公司的利潤在未付稅以前，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一一點八，一九四七年佔百分之一五點五，也有加增；但在付稅以後，前期仍佔百分之一〇點一，後期則佔百分之九點四，略有下降。地租與利息的收入，一九四七年的百分數，均低於一九二九年。地租在一九二九年佔百分之七，一九四七年只佔百分之三點九。利息在前期為七點九，而後期則為一點九。農業經營者及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後期的百分數，都較前期為高。在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欲求財產收入的壓低，只有在稅則上想法，如所得稅、遺產稅、及過分利得稅，都是很好的工具。過去美國的政府，曾在這個途徑上用過功夫，公司利潤百分數的升降，可以說明。但是這種努力，還沒有達到社會改良者所希望的。

蘇聯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照理應無財產的收入，可是現在這種收入，已經出現。利息便是財產收入的顯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階級的取消，並不是說大家的收入便會一樣。在勞務的收入中，還是有多寡之不同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發生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那就是：蘇聯的政府，對於那些收入較多的人，應當鼓勵他消費呢，還是應當鼓勵他儲蓄？在需要資本甚為迫切的蘇聯，自然是走第二條路，即是鼓勵人民儲蓄，而利息的付給，便為鼓勵儲蓄的工具。在一九三七年，蘇聯付出的薪資，為八二、二四七兆盧布，同年人民投資於政府公債的數目，為一八、二七四兆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為三、九八五兆盧布。人民的總儲蓄，約佔薪資總額四分之一以上。公債與儲蓄的利息，平均約為四釐，所以利息的收入，約在八億八千萬盧布左右。有人懷疑，在這種情形之下，蘇聯是否會產生資產階級。貝柯夫（A. Baykov）的推論，說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蘇聯的公債，為五千萬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分得債額三六五盧布，銀行儲蓄，為一千四百萬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儲蓄額為二八五盧布。平均每人的儲蓄數量不多，所以專靠利息維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貝柯夫的推論，有一點是站不住的，就是他假定每人所保持的公債或儲蓄款額是一樣的，但據柏格森（A. Bergson）的報告，在一九三七年正月，蘇聯的儲蓄存款，有百分之六十七，在百分之十的人手裏。假如這個報告是可靠的，那麼這百分之十的人的利息收入，也就可觀了。不過蘇聯的公民，即有利息的收入，也不能把他轉變為資本，從事於再生產，因為生產的原素，如機器及他人的勞力，不是私人所能購買的，而且蘇聯的憲法中，也不許有不勞而食的人存在，所以假如有人眞想靠利息維持生活，他的歸宿，可能是在集中營。

二

第二種經濟平等論者，其判斷一個社會的平等與否，不注重收入的來源，而注意各人收入的數量是否有很大的懸殊。

不管收入的來源如何，只看收入的數量，那麼社會中貧富的差別，在美國與蘇聯是同樣存在的。收入的不同，自然會影響到生活的不同。生活程度上的差異，美國與蘇

聯的社會中，也都一樣存在的。有人以為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生活程度的不平等，乃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但據斯大林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各人底胃口和需要，無論按質量或數量來說，無論在社會主義時期或共產主義時期，都不會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樣，大家平等的。」「如說社會主義要求把社會組成員們底需要都平均，劃一和均等起來，要求把他們的胃口和個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來，說按馬克思主義者底計劃，大家都應當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和同量的飲食，那就是胡說八道，誹謗馬克思主義了。」由此可見蘇聯在現階段的社會中，并不要求個人收入的平等。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兩個國家中，這種不平等的程度，有何深淺的不同。

簡單的說，從收入的數量去看，兩個國家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美國深於蘇聯。

我們先看鉅萬者的收入。在美國，淨收入每年在百萬元以上的，一九一四年約有六十人。以後十年內，此種富豪的數目，在二十與二百之間。一九二九年達到最高峯，共有五百十三人。在不景氣時期內，此數驟降，在一九三二年，只有二十人，一九三六年，也只有六十一人。最近這種富人的數目，想必又加增了，但詳細數字不詳。蘇聯收入最多的人，到底一年可以拿到多少盧布，我們沒有看到統計。但從一九四〇年所通過的所得稅法案中，我們曾看到一個規定，就是自由職業者，如作家、藝術家、及醫生等，每年的收入，有一千盧布可以不必納所得稅，但收入超過三十萬盧布的，其超過部份，納稅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見蘇聯也有收入在三十萬盧布以上的人。假定有一藝術家，每年的收入為五十萬盧布，以官價匯率五點三盧布等於一美金來計算，這位藝術家的收入，也還不到十萬美元，所以蘇聯的富翁，還趕不上美國的富翁。

但是比較兩國富豪的距離，還不如比較在一國內貧富的距離為有意義。美國的最低工資，自一九三八年規定為每小時二角五分以後，一九四五年加至每小時四角。一九四八年一月，杜魯門總統曾提議將最低工資，增為每小時七角五分（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為每點鐘一元二角七分）。今假定有一工人，每點鐘得最低工資七角五分，每星期工作四十點鐘，可得工資三十元，每年如作工五十二星期，可得工資一千五百六十元。蘇聯的最低工資，一九三七年規定為每月一百一十盧布，每年應為一三二〇盧布，約合美金二百五十四元。蘇聯的最低工資，雖然提不上美國，但是貧富間的距離，卻比美國為短。

除了以上的統計外，我們還可以收入集中的情形作一比較。根據美國一九三六年的統計，最富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收益百分之三六，最富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收益百分之五一。在另外一極端，最窮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收益百分之二；最窮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佔全國收益百分之五。關於蘇聯的情形，傳說極不一致。托洛斯基在一篇文章裏，曾說蘇聯有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的人民，其收入佔全國收益百分之五十。這種說法，顯然有點誇張。就是對於蘇聯抱敵視態度的達林（David J. Dallin）在他的「眞實的蘇聯」一書中，也只承認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四的人，收入佔總額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另外那些在集中營中被迫服勞役的，人數佔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一，收入只佔百分之二點三。關於蘇聯集中營裏面的人數，各人有各人的估計。他們是否有達林所說的那樣多，其收入是否如達林所說的那樣少，乃是蘇聯經濟組織中的一個謎，外人是無法猜透的。對於蘇聯收入的分佈，我們願意採取柏格森的結論。他研究了一九三四年蘇聯的薪資支出，發現蘇聯收入最少的百分之十的人民，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三；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七點八。另一極端，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其薪資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四點三；收入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其薪資佔總數的四〇點三。這個統計，勉強可與美國的統計比較。他表示蘇聯收入集中的程度，也還不如美國。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因為美國人除了勞務的收入，還有財產的收入。假如美國的收入統計中，把財產收入除開，那麼美國貧富的距離，馬上就可縮短不少。就我們手邊所有的統計來說，美國同一工廠中工人的收入，以及規模相似的事業，其經理的收入，彼此相差是無幾的。譬如蘇聯同一工廠中的工人，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間，據道布（M. Dobb）的計算，約為三與一之比。美國鋼業公司的工資，雖然分為三十等，但最低工資，為每點鐘一元零九分，最高工資，為每點鐘二元二角五分，相差的比例，還到不了三比一。蘇聯的經理，平均每月拿薪水二千盧布。美國的大公司經理，（在戰前曾有人調查過二百六十四個此類經理的薪水）在製造業中，平均每人每年得七萬九千二百元，在公用事業中，得四萬八千六百元；在鐵路局中，得四萬零六百元。彼此相差，也不太大。專靠薪水的收入，美國很少幾個人能每年拿過十萬元，但連財產的收入，便有不少人超過百萬元了。

三

希克斯（J. R. Hicks）在他的名著「社會骨架」一書中，在討論平等問題時，說是剷除不平等，是一種烏託邦的思想。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現。社會上還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種不平等現象，就是權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瀰漫於各種社會之中，我們很難想像一種有組織的社會，權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類演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出現；主人控制他的奴隸，貴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戶，資本家控制工人，組織者控制被組織的羣衆，官吏控制人民。從各種不平等的現象中去觀察，收入的不平等還是比較壞處最少的。這種不平等，可以測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現代的社會，必須控制這種不平等。但是為人類的自由着想，我們不要前門拒狼，而讓後門進虎。

這個警告，是值得我們仔細思量的。在現代的社會裏，為企求某一種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種的不平等。我們為要求收入的比較平等，很容易引進經濟權力的更不平等。在經濟平等這個名詞的含義之中，我們不要放棄經濟權力平等這一個概念。所謂經濟權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與私有財產頗有密切的關係。誰把握着財產，誰就把握着經濟權。美國的國會，為調查經濟權的集中問題，曾指派一個委員會，專門搜集這一類的資料。他們所搜集的意見，已達數十厚册。專家根據這些資料而寫成的叢刊，也有數十餘種。我們對於美國經濟權集中的情形，是有相當認識的。我們從這些意見之中，看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經濟權的意義，不但包括財產所有權，還應包括財產使用權。這兩種權力，在以前的社會中，是集中的，在現代的社會中，則可分開。像美國的電話與電報公司，股東多至幾十萬人。握有公司股票的人，雖然把握着財產所有權，但不能行使財產的使用權。在另一方面，公司的經理，可能的并未保有公司的股票，但整個公司的資產，都由他指揮使用。這種經理的經濟權，是很大的，有許多人歸他指揮調用，有許多物資歸他安排支配。這種人在美國的社會中，薪水很多，地位很高。

用同樣的觀點來看蘇聯的經濟組織，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特殊而有深刻意義之點。在蘇聯，生產工具是公有的，私人對於這些資本，并沒有所有權。可是蘇聯的生產工具，總得有人使用，所以財產的使用權，是寄託在若干人手

中的。在蘇聯，財產使用權的集中程度，超過美國，所以經濟權力的不平等，蘇聯大於美國。我們可以舉幾個例來說明此點。美國的鋼鐵工業，是相當集中的。美國鋼鐵公司，是美國鋼鐵業中的巨子，他手下的公司，便有一百三十家，可是美國鋼鐵公司的產額，只佔美國鋼鐵總產額百分之四十。在美國的鋼鐵廠中，除去美國鋼鐵公司之外，還有八家，每年的產量，均在一百萬噸以上。美國沒有一家公司，能夠指揮全國的鋼鐵生產。在蘇聯，所有的鋼鐵生產事業，都歸一個生產部門主管。這個主管部門的首長，對於鋼鐵事業中的指揮權，用人權，決非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或經理所能望其項背。再以汽車工業來說，美國有三家大汽車公司，其出產量佔全國約百分之九十。但在一九三九年，除了這三家公司之外，每年生產汽車在一萬部以上的，還有五家。蘇聯的汽車工業，與鋼鐵工業一樣，也是歸一個生產部門主管。這些生產部門，都歸行政院指揮，而行政院又聽命於黨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蘇聯經濟權力的集中，世界各國，沒有一國能比得上。在蘇聯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於在美國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資本家。在美國，因爲經濟權還未十分集中，作工的人，得罪了一個資本家，還可在別的資本家手下謀一位置，甚或自立門戶，小本營生。在蘇聯，得罪了政府，還有什麼別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餘萬方英里的蘇聯領土之內，他有何處可以成家立業呢？蘇聯國內政治權與經濟權的集中，是蘇聯人民的最大不幸。不過這種不幸，與社會主義無關，因爲在理想的社會主義體系之下，經濟權力，即財產的控制權與使用權，依舊是可以分散的。

四

若干社會學者，討論經濟平等一個概念時，特別注重機會平等。機會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機會的平等。一個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與別的人得到同樣的機會，因而得到他的天資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後根據他所受的訓練，在社會中得到一個適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對於這個社會應無怨尤。從這個觀點看去，一個社會，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機會平等，這個社會也就是平等的。

關於美蘇兩個國家中的受教育機會，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兩點。第一，蘇聯中學的最高三級，是要收學費的，而美國的公立中學，完全免費。第二，在大學及其他高級學校中就學的青年，美國人數多於蘇聯。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幾點來比較。一爲兩個國家在教育上的花費。美國於一九四〇年，花在教育上的，共爲美金三十九億元。同年蘇聯花在教育上的，共爲二百二十七億盧布，以官價折合美金，共爲四十三億元。蘇聯在教育上的總支出，多於美國四億，但如以用在每一個人民身上的教育費用來說，則蘇聯以人口較多，其平均數低於美國。第二點可以比較的，爲高級學校中學生的出身。據烏格朋（W.F. Ogburn）的報告，美國自由職業者的子女，有百分之五十二進大學，而粗工的子女，只有百分之六進大學。與此類似但不能作嚴格比較的一個統計，是一九三八年蘇聯高級學校中學生的出身。在總額五十三萬五千人中，出身於勞工家庭的，佔百分之三三點九，出身子農民家庭的，佔百分之二一點六；出身於薪水階級的，佔百分之四二點二；出身於其他家庭的，佔百分之二點三。蘇聯薪水階級的人數，決無農民及勞工階級那樣多，但其子弟在高級學校中讀書的，超過任何一個階級的子弟。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尚有此種現象，可見教育機會平等之難。教育機會如不平等，則欲企求收入的平等，或經濟權的平等，亦爲妄想。

五

我們已經從四個不同的觀點，來討論經濟平等的意義。從收入的來源與收入的數量兩方面去看，蘇聯均較美國爲平等。從經濟權的分派去看，美國又較蘇聯爲平等。這些現象，與兩個國家的經濟制度有密切的關係，如經濟制度不改變，這種差異，也難改變。教育機會的平等，現在蘇聯似乎不如美國，此點與經濟制度的關係不大密切，將來到底教育機會，在那一個國家中，更爲平等，第一要看誰能生產盈餘較多，第二要看各國的政府，是否肯以更大的盈餘，用於教育之上。這兩個國家，在教育上都是不很吝嗇的，因而在這兩國中，教育機會的平等，假以時日，將來似乎都有實現的可能。

英國整軍及其影響（倫敦通信）

朱若華

最近幾個月來，戰爭的陰霾籠罩着整個英倫三島。隨着柏林問題的緊張和整個國際局勢的嚴重，英國下院在九月底通過了重整軍備法案，延長現役軍人服役時間，大批徵募陸海空正規軍及補助隊，同時并擴充軍備生產，加強空中防禦，舉行大規模的空軍演習；對外則鞏固西歐五國軍事防守同盟，成立永久性的統一軍事機構，由英帝國參謀長蒙哥馬利担任主席。繼貝文在聯合國大會極富煽動性的演說之後，邱吉爾在保守黨的年會中發表了戰爭預告的演說。一時戰爭的風雲瀰佈着英倫海峽兩岸。今日的英國經過兩次大戰浩劫以後，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而現在又爲準備新的戰爭，走上備戰的途徑，這對於疲憊不堪的英國人民實在是極沈重的負荷。

英國爲什麼在這樣一個艱苦的時候，不惜一切來從事重整軍備呢？英國防部長亞歷山大在下院重整軍備的辯論中曾講，由於今後國際安全的不能確保，英國必須及時充實軍事力量，以應付萬一。這顯然是因爲國際局勢的日益惡化，世界和平前途的不可樂觀，英國才採取擴軍的政策。但從反映英國外交部意見的泰晤士報社論裏，我們可以進一步看出英國的重整軍備是爲堅決推行其既定政策，以便在今後的冷戰中，以軍事的力量來作後盾，以獲得外交上的成果。在權力政治之下，擴張軍備可能增加外交上討價還價的力量，甚至迫使對方就範，而英國的重整軍備即具有這雙重意義的。

國際局勢發展到今日，已到了陣容分明，互相敵視，加緊備戰的狀態。假如雙方不力圖和平解決與相處之道，世界和平前途甚爲暗淡。造成今日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其原因固然非常複雜，但英國工黨政策在外交上未能發揮協調作用，亦是主要的一個因素。英國在工黨政府領導之下，并未做到如一般的理想，成爲溝通美蘇關係的橋樑；相反的，它却成爲美國的幫手，從中促使美蘇分裂的惡化。從基本上說，貝文政策，是邱吉爾政策的延續，工黨的外交政策處處以保守黨的政策爲依歸。英國外交，始終沒有脫離帝國主義的色彩，貝文自始即獲得保守黨的贊助而

爲許多工黨議員所擯棄，這是工黨外交政策的失敗，對於世界和平前途，實在是非常惋惜的事情。

戰後英國工黨登台，普遍的帶來了新的希望，工黨政府對內採取溫和的社會主義政策勵行種種改革，以便逐步達到社會主義的理想。對外則須配合國內的政策，擺脫舊的束縛，推行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以促進國際間的諒解和合作。但是過去的事實却證明了工黨的外交政策并未脫離傳統勢力的羈絆，并且反而爲舊勢力所決定。美國支加哥論壇報的主筆麥考密克（R. R. Macormick）於今夏訪問英國之後，有一句極饒意味的話，他說英國少數的貴族階級不但決定了英國的外交政策，并且在若干方面影響到英國的政策。事實上，邱吉爾在富爾登（Foulton）的演說已成爲英美外交政策的準繩。貝文處處莫不與美國攜手，共謀對付蘇聯。設若英國戰後能眞正採取不偏不倚的政策，不捲入金元勢力之下，當馬歇爾計劃提出之後，卽反對美國帶有任何政治性的企圖，以促進世界和平合作爲前提，則國際局勢當不致演變成爲今日的局面。貝文既然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外交政策，緊緊的追隨美國之後，有時甚至站在美國的前面，來分裂整個世界。國際局勢當只有愈加惡化，英國亦惟有走上備戰的途徑。所以英國重整軍備，是它現行外交政策必然的結果，整軍以後英國必更加緊推行其既定方針。

英國整軍備的結果，無疑的國際上以及國內的政治經濟各方面均將發生種種的影響。就國際的局勢而論，英國的重整軍備將愈增加世界的動盪和不安。邱吉爾曾一再強調安全必需建築在武力的基礎上；英國一般的輿論亦認爲惟有以實力來支持外交，國際問題才有和平解決的希望。但是近代的歷史却剛剛得到相反的結論。擴軍的結果最後只有訴諸於戰爭，國際和平并不能單靠武力來保障。再看美國在軍事上的積極措施，和最近北大西洋軍事協定的準備，英帝國會議關於軍事聯防的會商和拉攏中東各國締結軍事協定等等，更可以推測將來的趨勢，假如戰爭萬一不幸爆發，那將是一次全面性徹底毀滅性的戰爭，英國在地理上是最重要的戰略據點，不論誰勝誰敗，英國都難逃脫毀滅的厄運。英原子能專家白萊克教授（Prof. P.M.S. Blacket）在其新著「原子能的軍事與政治影響」一書內對英國的處境曾加以申論，他認爲如果一旦戰爭發生，英國惟有採取武裝中立一途，以武力拒絕交戰國任何一方佔領英國本土，以爲進攻對方的根據地；這樣或可以幸免戰爭的慘禍。（編者按：請參閱本刊上期倫敦通信，專論此事。）但現在英國已成爲美國空中堡壘的根據地，英美已密切合作，準備戰爭，假如英國不能懸崖勒馬，改變其現行政策，恐將招致空前的浩劫。

重整軍備對於英國國內政治經濟各方面尤有重大的影響。在經濟上，英國戰後已成爲債務累累的國家，而國內人民生活水準已降低到不可再低的程度。目前它必須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來從事經濟復興，以求自給自足；一方面要鼓勵輸出，減少入口，以平衡國際收支，同時必需儘量增加生產，緊縮消費，利用生產和消費的盈餘來作工業投資，這樣才能繼續增加生產，提高一般生活水準。目前是英國經濟建設途程中最艱苦的階段，不能容許任何浪費和消耗，英國再沒有多餘的人力、物資來重整軍備。就人力來說，由於復員的滯緩，許多工業，尤其是煤和紡織業等缺乏勞力，產量因此不能增加。英國在這時整軍，則一部份工人必需應徵服役，或轉入軍需工業，不但他們本身不能從事生產，并且還需靠他人生產來維持，這對於國民經濟是雙重的損失。再就物資來說，許多工業原料，英國都非常缺乏，尤其是鋼、鐵、鋁和若干金屬原料等。整軍以後打擊最大的當爲機械工業，因爲鋼鐵將移作軍事用途。由於飛機的產量將增加一倍，需要大量鋁片，明年起將不再製造鋁鍋，若干家用金屬器皿亦將隨之減少。在資本主義發生恐慌的時期，重整軍備爲解決工人失業問題的良劑，但在目前英國人財兩缺的情況下，整軍的結果只有使物資愈加短少，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現象，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亦只有再行降低。工黨政府本擬積極進行建築房屋、學校、醫院，并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但整軍後將無形中延遲其社會主義政策的設施，還在政治上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在下院的辯論中，工黨一部份議員反對整軍破壞經濟復興的原則，或者主張整軍必須美國以新的租借方式來維持。重整軍備與經濟復興是互相對立的。整軍的結果，不但破壞英國經濟建設的基礎，并且可能使英國更加依賴美國，成爲美國經濟上的附庸。

這裏値得注意的是英國一般輿論的趨向。大體上說來，英國今日的輿論幾乎是一致的，都贊成政府的整軍政策。過去英國的言論對每一個問題都有進步的、自由的、保守的分別，但今日在這樣一個嚴重的關頭，對於整軍問題意見却無二致。去年以前英國的輿論在督促政府，現在則好像被政府的政策所領導，這是英國輿論上一個明顯的轉變。

然而英國一般的輿論果眞可以反映英國人民的眞正意見嗎？如果普遍地多和英國人民接觸，則可以發現英國人民的想法和輿論的主張隔有很遠的距離。今日英國人民在心理上和情緒上與一九三八年的情形都是兩樣，那時他們是爲反法西斯侵略而戰，他們是堅定的，知道戰爭必然來臨，他們雖然憂慮，但并不懷疑；可是今日的情形却有不同，他們不但憂慮，而且非常迷惑，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沒有敵人的，他們不知道爲什麼要戰爭。他們沒有備戰的情緒，他們的心是冰冷的。今日現實的政治家們只注意到準備戰爭的武器，而不顧忌人民的心情，在這樣的情形下，英國還能打第三次大戰嗎？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寄自英國

（上接第十一頁）

趙邱等，掌握着地方團隊四個旅，企圖劫持衞立煌以下高級官員。秦祥徵原爲瀋陽自衞總隊長，指揮着兩千多人。秦過去與瀋陽市長董文琦私交甚篤，雖已奉命把守機場扣留衞立煌趙家驤王鐵漢董文琦等，但秦事前仍猶豫不決，在十月卅日的上午就把劫持的企圖告訴了董文琦，董當時勸以明大義，多考慮。秦在瀋陽市府大樓內徘徊，遲遲不能決定下手，此時董文琦趁機溜出市府。卅日那天，衞立煌用電話找周福成不到，又得到董文琦的報告，斷定大局不可收拾。當時北陵渾河兩機場已不能使用，立刻通知東北各省市府及黨團負責人、國代、立監委趕到東塔機場撤退。衞立煌，趙家驤等到達機場時，僅有的一架飛機內已經人滿，命令衞兵往下趕人，衞兵等一面請人往上拖，算是爬上了機艙，遼北省主席兼東北騎兵司令徐梁的一大包金圓劵被拿出飛機，東北政委會副主委高惜冰失落了手杖。卅日下午四時飛抵葫蘆島。同一飛機撤退出來的有剿匪總司令衞立煌，參謀長趙家驤，遼寧主席王鐵漢，遼北主席徐梁，瀋陽市長董文琦，新一軍長潘裕昆，八十三軍長龍天武等。未能撤出瀋陽的有東北剿總祕書長兼合江主席吳瀚濤，嫩江主席彭濟羣與一羣國代立監委及各省廳處長不下二百多人。卅一日王鐵漢，董文琦，徐梁，潘裕昆，龍天武等飛到北平。十一月六日衞立煌，趙家驤也撤到北平。杜聿明在葫蘆島等候營口的五十二軍撤退，十一月七日僅撤出一個半師到秦皇島，杜聿明於八日飛抵北平，九日飛京述職。整個東北從此全失，十三個軍，僅撤出一萬多人，其餘全軍覆沒，打破任何戰史上所未有的損失紀錄。

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

亞爾撲提 Gordon W. Allport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富芮葉 Gilberts Freyre 巴西及阿根廷社會學教授
葛維其 Georges Gurvitch 法國社會學教授
何爾海母 Max Horkheimer 紐約社會研究所所長
勒斯 Arne Naess 阿士諾大學哲學教授
芮克曼 John Rickman, M.D. 英國醫學心理雜誌編輯
沙利凡 Harry Stack Sullivan, M.D. 華盛頓心理病學專科學校理事會主席
薩賴 Alexander Szalai 布達佩斯大學社會學教授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是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其主要工作之一，是促進國際了解。該組織認為，要人們相互了解，先要改變他們的心理態度，使之趨於接近，本年六七月間，該組織曾邀集上列八位世界知名的社會科學家，研討國家侵略的原因及國際了解必需的條件。本文係他們研討的結論；簡明寬闊，扼要客觀。當此國際風雲日亟，劍拔弩張，和平不絕如縷的時會，國與國間還有了解的可能嗎？「王道迂闊」；然而根本之圖，似乎仍是重要。爰為譯出，以供愛好和平人士及國內社會科學家們的參攷。李惟遠譯並誌。

人類已經進入其歷史的一階段，可以用科學方法研究足以引起戰爭的緊張情況的原因了。本小組的集會即象徵這種情形：破題兒第一遭，許多地域的人們，經由他們自己創設的國際組織，邀請若干社會科學家，運用他們的知識，來研究我們這時代的一些主要問題。在本文中，我們八人雖然各有各的着重點，且對本文的廣博性及如何完成文中的建議，意見亦不相同，但我們全體對文中任何一部份的重要性，都是一致承認的。

我們同意下列十二段的意見：

（一）就我們所知，並無證據，足以證明戰爭是「人性」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人們的能力和性情雖然大不相同，然吾人相信，人們有其共同的重要的需要，必須滿足，始可建立和平，維持和平：普天之下，人們都要免於饑餓與疾病之憂慮，並要免於不安與恐懼的心理；人們都要同伴，都要他人的尊敬；都要個人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二）和平的問題在使羣體與國家的伸張與侵略限於可以管束的範圍之內，並導之於個人及社會建設的目的，俾不至剝奪他人。此目的不能用表面的改革或單獨的努力達到。社會組織和吾人思想的基本改革，殊為必要。

（三）如吾人想避免導致戰爭的侵略，則必得對近代生產力及原料，善為利用，妥加安排，務使社會上有最大的公平。經濟的不平等，不安定，和挫折失望，將產生羣體和國家的衝突。凡此皆是緊張情況的根源，往往使某一部份人誤會另一部份人為一種威脅，其實乃由於眞象認識不清，或接受過份單純的解決方法，或由接受煽動家不擇手段犧牲他人的吶呼所致。

（四）近代國家間和國家集團間的戰爭，乃由許多一代傳一代的神話，傳統和代表國家尊嚴的符號等所孕育而成。現在還有許多社會的符號，帶着國家主義的色彩，阻礙着思想自由的傳播，通不過政治的疆界，而其實，今日之世界，已是互相依賴的了。

（五）作父母和教師的，其幼年時代及其環境和現在都不相同，他們那時所養成的態度，與所培育的忠忱，在目前遽變的社會裏，已不足以有效地領導青年的行動。這種事態的程度，他們很難於認識。各種教育必須反對國家性的自是，而努力教青年對自己和別人的社會生活方式，作客觀的研究和自我檢討的評價。

（六）近代高速度廣範圍的交通發展，實為凝結世界的一大助力。但是這種發展也可以增加一種危險，即眞理的歪曲將被宣傳到許多不能辨明眞偽，或不自知受騙，或被引入歧途的人們。所以善用大衆傳播的方法，以鼓勵對他國人民的了解，實是聯合國各種機構的特別職責。這種瞭解必須是相互的。假如各民族都能看自己，猶如別人看他們，對和平一定有幫助。

（七）劣等地位的繼續下去，對任何人民集團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及其他原因，對殖民地的剝奪或壓迫少數民族，時間一久，都是與世界和平不相適合的。我們以社會科學者的身份，找不出任何證據，證明那一民族的本身是劣等的。

（八）許多社會科學家正在研究這些問題。但他們仍為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和階級的不同所分開。這些不同使他們難於對偽科學的學理，作有效的拒絕，而這些偽道理一直被政治領袖們為他們自己的目的利用着。

（九）凡政治的或經濟的勢力迫使研究調查的人接受狹隘的黨派的意見，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是無法保持的。因此，吾人亟需一種集中力量，經費充足的國際研究和教育的計劃。

（十）舉例言之，我們建議社會科學家們作廣泛區域的或國際的合作，創辦一所國際大學及在國際監督下的若干社會科學的世界研究所。我們相信，國際科學尋求事實的研究，將有助於各國文化的有用知識的獲得，並能將全世界人民的合法願望與帶危險性的不安和緊張情況的根源，揭示出來。此外，研究家庭中、學校中、及青年組織和其他團體中所採用的教育方法，影響或支配着青年的心思，使他們傾向於戰爭或和平的，也是有價值的。從這類研究所得的知識的分佈，我們可以預期：指導國家教育計劃的具體建議，一定可以提出。

（十一）近年來物理的和生理的科學研究的結果，很有表現。這些實際的結果中，有些卻未能減少文明世界的緊張，反而使之驚擾騷動。科學家的研究被用去發展原子和生物戰爭，他們本身當然不負為害世界的責任。這種情況反映出目前決定科學用途的力量。假如人們都不忽略個人及社會內發的及外來的力量所加於他們的影響，則科學及工藝發展的潛能用於建設方面的機會，將可增加，敢為斷言。

（十二）在這種獲取自我知識及社會透視的工作上，社會科學——人的科學——實有重大責任。今天各種社會科學面對着共同問題的時候，他們的界限就逐漸消失；這是個很有希望的現象。社會科學家可協助各國人民明瞭：一個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總是與所有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相關連的；這世界不須繼續成為互相殘殺的場所；為自己的羣體的努力與為人類的努力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大局的搶救

觀察特約記者

軍事上的搶救：建立新兵團和新防綫

（觀察南京通信）

大局演變到目前，眞是到了千瘡百孔不知如何補救的地步了。大局眞是無救了麼？也並不見得完全如此。是在當軸的「一念之轉」麼？這是太籠統的一種懸想。問題是在於怎樣轉，向那轉，和轉的程度怎樣。記者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如何，想來想去還是不便明言。現在所提的只是近日政府的幾種打算。首先應當提到「軍事第一」上的救急。

目前的軍事可以向下列三方面注視。一是北中國的太原和歸綏之戰。一是正在進行的徐州之戰。一是當局籌辯中的建立新兵團，即第二綫兵團和建立保衞華中和東南的新防綫。傅作義將軍的匆匆來去，當然是爲了今後他一個人對華北大局如何担負挽救上的全責問題。據聞是「圍殲」地決定了。現在華北戰場形勢上雖像有很多的棋眼：如平津外圍的許多小據點，冀東走廊，和晉冀察綏的許多大據點如張家口、保定、歸綏和太原，但有決定性影響的當然是歸綏和太原。這兩大省會的得失，將是今後三北全局上見分曉分高低的關鍵。倘此兩處有失，尤其是太原有差池，那麼，所謂晉冀魯豫熱察綏邊綫地區，或所謂三角地帶的會戰決戰以及所謂保衞平津的事，都是徒託空言。據悉歸綏太原兩戰區的雙方兵力近於一比一，裝備也是對等的，補給交通綫除了空運上國軍佔優勢外，陸上也難分優勢和劣勢。軍事上，凡是這些條件雙方達到對等時，就只賸下了一個重要因子以決定勝負了，那因子便是雙方的指揮藝術和士兵的戰鬥意志，以及民心民力的如何歸趨。關於這一點，有過去的事實和眼前的例子作答覆，讀者想是可以自作判斷的。徐州戰場上，淮海區間，雙方的兵力大體上也是一比一，裝備和交通補給上比較的是國軍佔優勢。國軍大約有五個兵團和交憲兵部隊，還有地方武力，以第八軍爲骨幹的李彌兵團，以五軍爲骨幹的邱清泉兵團，以廿五軍爲骨幹的黃伯韜兵團，都可稱之爲勁旅。但對方的幾個縱隊和「快速」，「兩廣」縱隊，兵力也旗鼓相當。統帥指揮上的人事，國軍是衆所周知的劉峙，共軍則是主將之一的陳毅。聞最高統帥曾經一度請「小諸葛」白崇禧代劉經扶坐鎭徐蚌，終以白氏的「謙遜」而作罷。這一戰場的形勢是以徐州爲中心，西迄隴海綫上的蘭封而東至海州。包括津浦極南段的兩大據點，蚌埠宿縣，可是重要的兩個棋眼，一是蚌埠，一是淮陰。淮陰位於洪澤高郵兩湖，是過去三年來雙方拉鋸的要地，是蘇北的重心，此地一有差池，京滬必立即感受威脅。爲了集中兵力，當局曾擬將徐州迄蘭封一綫縮短，以配擺在徐東新安鎭一帶地去。國軍統帥部的判斷，共軍很可能在徐州新安鎭之間配備強大的兵力，採取主攻，企圖穿過隴海鐵路的徐新段，一面牽制徐蚌正面的國軍，相機迂迴徐州，用以切斷徐蚌綫；一面則直奔淮陰，沿運河湖沼地帶躍進，將國軍的運河防綫突破，切成幾段，使國軍首尾左右不能相顧，而乘隙陷虛，向京滬鐵路綫進迫，然後配合皖中皖南的攻勢，迂迴蕪湖句容而在南京的東面進襲江陰鎭江。這是取京滬的一套傳統的戰法。顯然的是，這一戰是長江以北國軍第一綫兵團的最後一戰，這一戰的影響必然是十分重大的。

近日，最高當局正着重於計劃建立新兵團，即所謂第二綫兵團的問題。華北方面據說是已經國防當局允許傅作義的擬款和裝備，成立五個軍，實際上是五個師。長沙綏靖公署所轄湘贛兩省，也答應程潛主任成立五個軍或五個師。其他三南的重要省份，也將陸續建立新兵團，設立新防綫。政府旣準備萬一時遷都於廣州，則廣州綏靖主任宋子文所轄的幾個省當然也需要成立新兵團。最近各省主席羣集首都商討「搶救大局」，除討論如何維持金元券，鼓鑄金圓硬幣和民食軍糧等問題外，最緊要重大的問題恐怕就是爲建立新兵團和新防綫的問題。本刊六、九各期的通訊裏，記者曾不斷地提到所謂「中國的馬其諾防綫」的問題，現在看，彷彿是很有點言中了。不過在此應附帶來一個小插曲，就是這次南中各省乃至台灣主席的會議，獨廣西省主席黃旭初缺席，同時李副總統的夫人郭德潔和桂系大將之一的李品仙都飛回桂林去，想是廣西的章法另有一套的。

經濟上的搶救：鑄金圓、售國產、豪門出錢

政局動盪，須「軍事硬幹」，但拚命的人們是需要錢的。聽說當局將對兵士，佈恩施仁，普通士兵的餉要自硬幣六圓起。現在統計台灣所練的新兵，和第一三兩個陸軍訓練處所訓練的以及新近補充擴編的九個青年軍，以及准備在湖南徵募的二十萬新軍士，再加上華北華中和徐州會戰的，這軍額是很可觀的。每月需要多少硬幣金圓，那只好讓國防聯勤總部作統計。可是事到如今，已臨燃眉之關，不在金銀上下大注，也難以談到搶救危局和軍事硬幹了。前日（十一）行政院的修正財政經濟緊處分令，當然是貨幣政策的又一重大修正，是想以硬幣支持金圓券，這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表現，也是當局硬揑頭皮的一張牌，蓋非如此亦難以度過這危急萬狀的「險關」。此令一出，物價猛跌，恰好又碰上中央社的「徐東大捷」，慌亂的人心似乎爲之一鬆。但深刻的觀察家，很耽心這是一種「迴光返照」。鼓鑄金圓、改訂外匯率、現在算是黑字白紙上的政府諾言，然而金圓的支出，僅就軍餉一項算，已是驚人的浩繁，再加上其他和政費，不知究竟要多少黃白的金銀才能應付這筆大開支！因此，就不由得使人聯想到立即清算豪門的問題要孔宋等豪門立刻眞能「大發慈悲」掏腰包，大把出錢。此間近於事實的一種推斷是，最高當局很可能已向孔宋等指出他們的最後存亡關鍵豪門巨頭當然也是很敏感的，可能已答應「照辦」。不過豪門是講究體面的，死也不肯在中國百姓面前承認他們在過去確是從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身上吮吸了那樣多的血汗錢，他們可能來一個迂迴式的貢獻。他們的財產當然不在國內而在外邊。他們在美國，在中南美，或其他歐洲的安定的小國裏購有大批的股票，和地產，在南洋各地購有橡膠樹木園，他們可能用這種股票或不動產向美國銀行作抵押，進行借款，通過「美援」的外衣，而把錢送進來搶救中國的經濟「險關」。美國政府對南京政府，基本上是願意救援的，其所以吝而不予，或遲緩，或在數量上打算盤者，主要的原因還不僅是因爲中國的軍事步步逆轉，更是因爲中國無東西作抵押，怕借出去，他日難以奉還。現在，旣然有了與南京政府密司關聯的人物進行實物抵押担保借款，而在形式上又是美國政府的「慷慨外援」，那又何樂而不爲？此一計劃，豪

門如非徒謂空言，數量也許不會太少的，可能在五億至十億之間。

這一着棋之外，當局還可能另有一打算。那就是出售國營產業，記者在此姑且簡稱之爲「國產」。如「中紡」，「中油」「中膠」「中泥」等公司。配合着限價的取銷和最近貨幣政策的重大修改以及金圓硬幣將出現，政府如肯放手出售，還是有人肯出錢買進的。這末一來，既可收回大量的金圓券，也可以得到不少數額的金條和銀元。這一着，搭上「豪門出錢」，對於經濟財政上的搶救，是很可能發生相當有力的影響的。不過這要回頭看看軍事上是不是能夠在長江以北挺得住，擋得住，進而措京滬於磐石之安。否則徐州保衞戰不利，京滬危急，政府遷都，北方再守不住歸綏和太原，而使軍事發展到長城邊和平津的邊沿，那末，津京滬漢的「國產」，雖欲出售，亦必無人肯買進，一切皆屬枉然了。

人心上的搶救和政治上的搶救：

「？」和「？」

軍事與經濟是政治上的兩大支柱，而民心的向背更是政治的「重心」。這重心一失，或一偏，則政治的危機立見。但是經濟上的措施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經濟上措施得當，未始不可以挽民心於將墮，軍事局勢能夠支撐得穩，也能夠勉抑民心上的失望悲觀，或對於民心的向背暫時予以稍轉。然而這一切仍要向國是國策方面看，政治機構上的人事是否眞已鼎新健全，符合人民的需求而達到萬流景仰，物望所歸。

三年的內戰可說是已把人心打得破碎了。「行憲」前後的內政外交大計如那一套「親美反蘇，對付友黨」，「拉攏小黨拆散大黨」的技倆，降而至於行政官席，形同分贓；立法毀法，另立條款；特種刑庭，妄入人罪，禁錮青年，就是最近八一九的限價，發行金圓券，強迫人民以美金白銀來兌換，這實無異強迫搜括和掠奪，益以搶購潮生，取銷限價，修正「幣改」，重訂標準兌換金元券，這一切的一切，無容諱言的是給那已經破碎了的人心又加上了一重又一重的磨難。一言以蔽之，今日人心算是近乎失盡了。自己的黨既已成爲無羣衆無幹部無人材的一副空架，而所謂黨同「行憲」的友黨更是醜態百出，大小事都在百姓面前鬧笑話顯顯眼。但今天我們畢竟還是在「行憲」政府統治下做善良的百姓，說句坦白的恭維話，正不啻生死由你「託庇宇下」一切交給上天。我們爲了眼前的災難得以暫免或倖免，我們寧肯退一萬步地說句「違心」的話：我們還是在「呼籲停戰，幻想和平」的悲憤悽愴的一種心情控制下凝望着大局能有萬一的好轉。但想了又想，在這「人心上和政治上的挽救」問題的下面，我們只能填上一個「？」。記者在上期本刊的通訊裏，記得已涵蓄地，幽默地以一種戒愼恐懼的心情對大局描繪出來一幅近於事實發展的輪廓畫。現在不妨重來就事論事，作一報導，包括着消息上的採訪和推斷。

照此間權威政論家的一種觀察：一個「開明的「獨裁」的政治家，始終有一個中心邏輯，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就是他要以「完成自己的一切」爲最後鵠的。一切的變是圍繞着以「他能否保存自己的一切」以爲斷。其所以要排除異己而依靠親信家族戚室，是爲了懼怕大權旁落，運用驅使上不能隨心所欲。他就是如此這般地一步一步在變。倘是情勢演變仍覺無大礙於自己的威權，江山當然還是「仍舊貫何必改作」，甯可盲人瞎馬夜臨深池的往下拖，死也不願意作眞的新的變。但是眞的到了自己的集團乃至個人的權勢財利榮譽就將「垮」的境地，曉得再不更張改弦就眞的要完結了，到這時，項羽式的英雄，政治家即將瀕於「垓下」的「險關」，這算是有希望，是回頭的日來到了。雖則，已嫌過遲，他還是有可能「回頭」的。第一步可能是祛除無用的親信。再一步是疏遠或祛除戚室和家族。因爲再用他們或袒護他們就將對自己大不利，只好「忍痛」而「割愛」。到這時也許才肯回頭來考慮：先用最親信，若此不足搶過險關，則用次親信，如此仍不足以濟事，則用非親信，仍不足，則可「忍痛」起用夙所厭惡的人，仍不足，則再忍痛以用向所最厭棄的人，到最後威力不足以搶救難關，渡險關，或所謂挽既倒的狂瀾，那就連素日引以爲敵仇者的人材亦肯起用了。因爲大家認爲勉可救大局的人材偏偏就在這般人裏。不這樣辦，更無妙算可言。不過，現在從此地位一鳥瞰，這一步驟僅僅還屬於一種可能性的範疇。「事急矣，宜亟圖之」，據猜想正有人向當局作如是的大胆進言，同時，也有一種跡象可尋，當局正在作這一驚人章法的考慮。自然，是否眞有此可能，或縱屬可能，是否爲時已晚，那是尚在未定之天的一個問題，記者也僅能夠作如此這般的報導而已。

海外小救星，蒲立德來矣

大局正是一片搶救聲，這比剛成過去的「搶購潮」還來得有聲有色有光有熱有力。正當這時候，「盟邦」救星著名反蘇反共的外交家蒲立德將於日內光臨首都。不過在美國民主黨競選已告勝利，杜魯門蟬聯，杜威已竟落選後的今天，此君又命駕來此，風頭已打了個大大折扣，所以我們只能呼他做一個「小救星」。

話再說回來，杜魯門政府基本政策上還是要反蘇和反共的，因而「援華」，原則上也是不會有很大的改變。不過由於這次杜魯門當選總統是意外的勝利，這勝利的背景與對蘇聯的外交政策的改變不無關聯。我們一向認爲：就目前的美蘇實況以推說所謂新的世界大戰，美蘇關係的現段依然是在「冷戰」程度上打轉。由杜魯門對蘇聯的最近的言動看，由馬歇爾可能辭去國務卿而以文遜法官來代替，以文遜可能代表杜魯門移樽就教地往蘇京會晤史達林總理看，和從對德日簽和約之可能被重提，以及從最近東京判決日本甲級戰犯而提到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和侵蘇的罪戾等等方面看，杜魯門在美國人民的壓力和華萊士的影響下，確是已在緩和對蘇的「冷戰」作考慮。美蘇關係很可能向如此的一個方向發展：「雙方知難而退，暫時適可而止」的。「援華」基本上原是爲了防蘇的，現在美國既想暫且「忍耐」「和好蘇聯」，那末加緊支持一個「反蘇」前哨的國家，已非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了。文遜之任訪晤史達林的特使是不是可以和當年羅斯福總統派遣戴維斯之訪蘇等量齊觀，那是不敢說的，但「東施效顰」，杜魯門可能是要向他的總統當選的支持人和集團顯露這一姿態的。基於此種認識，記者的推斷是：蒲立德此來，對政府的喁喁望「美援」是不容多存奢望的。不過這位小救星畢竟是來自美國的，不失爲南京政府幻想中，聊以慰藉的靠山。蒲立德此來可能是對政府在當前險惡艱難的局勢下重新作一觀察。第一他可看一看政府還有救沒有救？第二是還救得活麼，和是否一經新的大量的「美援」便可起死回生。第三是，經他兩黨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的眼光裏，南京政府最需要的究竟是那一種援助，以及美國「援華」的實施達到如何程度便可使國軍的劣勢變優勢，進而可能挽救這垂危的「中國赤化」的局面，以便回去作建議乃至慫恿國會的共和黨及部分的民主黨議員向杜魯門作攻勢的積極建議。第四是：這位小救星也可能代表美政府向當局作「徹底革新，改造政治機構」的一種有力的建議，也可能是施一種「友好」的「忠告」式的壓力，期望當局眞能立下決心作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革及政治上的全面改造，和政府的全部改組。（十一月十三日寄。）

瀋陽失守的尖銳報告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天津通信）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杜聿明率領石覺、趙公武兩軍出關，卅七年十月三十日，衛立煌率領潘裕昆，龍天武兩光桿軍長撤出瀋陽，兩年零十四天的時間，東北國軍整個垮台，政府退出了東北。不是林彪太兇，而是國軍太糟，政府太無能．騙人不成，反把自己騙了。

接收就是「劫搜」，一點也不錯。國軍出關後，佔領的面積雖然不大，却是東北工商業精華的地區，有煤、有鐵、有大豆高粱，有日本人遺留下的無數財產，足夠你搶我奪，你搜我刮。少數的清廉官員除外，那個人不把東北當塊肥肉，狠吞虎嚥？接收那天，就是喝東北血的開始。敵僞產業總值兩億零三百十一萬三千七百金圓，佔全國敵僞產業總值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東北的敵僞產業，一直到十月三十日國軍撤守瀋陽的那天，一文也未經政府收回，全部在各機關與私人手中，變了兩年多魔術，細軟全變成了鈔票，沙發都運到了北平。到過東北，凡是與「接收」沾上一點邊的人，那個不是大大的暴發，在去冬七次攻勢的時候就「衣錦還鄉」了？舉個例子說，如前東北長官司令部的祕書長余協中，政治部主任余紀忠，他們在平京的家像小皇宮一樣，過去他們是連沙發都沒有的窮小子。東北人要給余紀忠立貪污紀念碑，靠了某大員的解圍，才偷偷的溜出了瀋陽。余協中曾兼任杜聿明辦的中正大學校長，學生罵他是教育販子。學生流亡在北平一千多人，他替學生在北平社會局領麵粉，還從中套取，學生一度遊行請願，硬要余協中交出吞沒的麵粉，余一氣通知北平社會局不再發給學生救濟麵粉。在關外喝東北人的血，到關內照樣喝東北人的血，簡直走了人形。高級軍政官員，開始就沒有根在東北有作爲，東北日僑俘管理處長李修業，向日本人受賄貪污，玩弄了多少日本女人？放了多少日本戰犯？曾被冏國的日僑向麥帥總部控告。瀋陽警備司令彭璧生把李修業從杜聿明面前保出，在官官相護的鬼臉下，李修業一變，跑回四川老家做了寓公。彭璧生的錢也夠養活三代人了，在李之後，默然南返。杜聿明本身也不務正業，辦學校，搞報紙。廖耀湘一類的軍師長也是一樣的胡來，當官的嫌官小，有錢的嫌錢少，自己怎樣方便怎樣做，不管甚麼叫國家人民。東北運輸總局長陳延炯，救濟總署東北分署長劉廣沛，吉林主席梁華盛都是由於貪污的劣跡離開東北的，政府一個不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它腐化下去。東北統一接收委員會監察處長馮庸，東北長官部參謀長趙家驤，東北生產管理局長王家楨這些人的操守如何？國防部與東北監察使署有舊案可查。陳誠總長在東北的時候，對一羣老虎看得更清楚，可惜他不敢下手，只打了一個蒼蠅——瀋陽工務局長李榮倫。

卅五年五月，林彪退守到松花江以北後，滿以爲這就是永久戰勝了「共匪」，政府的軍政官員在自己的控制區內的長春、瀋陽、錦州、四平、永吉、營口幾個大城市，得意忘形，吃，喝，玩，樂，盡量享受。勾結商人，作生意，大發財源。軍官全兼副業，士兵的紀律無人管束，民間遭受比張作霖時代更甚的痛苦，軍隊拿百姓不當人看，人民也不拿軍隊當衛國的兵看，愁恨日深。花天酒地，胡作亂爲，轉眼又過去了一年，林彪的大兵過江打來了，新六軍的廖耀湘也好，新一軍的潘裕昆也好，不論美式還是中式裝備，誰也擋不着林彪的進軍。一次、兩次、七次攻勢過後，東北局面完全變了，剩下瀋陽、錦州、長春三個孤點，衛立煌總司令一手玩三球，有些不靈，總會有一個下落地。軍政官員們，知己知彼，趁着今春喘息的機會，運黃金，鈔票，姨太太，甚而連日本人留下的花都送到關內，他們早已斷定東北守不下走了。林彪也知道國軍再也守不住東北。他衡量長春、瀋陽、錦州，國軍三個據點，究竟先攻那一個？先攻長春，再攻瀋陽，再攻錦州，須打三次戰。先攻瀋陽，再打錦州，長春可垂手而得，三個仗兩次打完。如果先攻錦州，瀋陽長春可垂手而得，三個仗合一次打。於是林彪於十月初旬採取了最後的三合一戰法。十月十五日輕取錦州，俘擄了國軍冀熱遼邊區總司令范漢傑。十七日長春國軍六十軍長曾澤生叛變。僅兩天的時間，國軍在錦長兩地損失了六十、新七、九十三、新八等四個軍。軍長也全被俘。錦長失守後，林彪以鉗形的陣勢夾着國軍最後的據點瀋陽。

蔣總統在十月十五日，錦州失守的那天，從南京飛到瀋陽，召集衛立煌以下各將領開會，決定命令鄭洞國由長春卽刻突圍南下，瀋陽國軍向新民集中，準備再攻遼西。總統十六日飛到北平坐鎮，十七日長春曾軍突變，十八日總統再飛瀋陽，堅決的命令衛立煌指揮瀋陽兵團向西攻新立屯黑山，切斷共軍後路，收復錦州，重新鞏固遼西。衛立煌以速渡遼河，大凌河，柳河向西進軍，易犯背水之戰的忌諱，與其收復錦州，不如加強遼南，經營已收復的營口，重新給東北找出路。閻統帥部堅持自己主張，並派顧祝同總長在瀋陽監視執行。中央與地方對戰略的意見不一致，拖延至十月廿日，瀋陽的新一、新六、六、七十一、八十三、四十九等六個軍由廖耀湘率領，從新民分向新立屯黑山攻擊。五十三軍守瀋陽，五十二軍守營口。廖耀湘此人，好大喜功，自私自利，但自共軍七次攻勢以後，他私生活日趨糜爛，早無鬥志。且對杜聿明，陳誠，衛立煌都有成見，黑山一戰，他還是不絕對服從命令，想保全實力。可是林彪並不允許，首先攻垮廖耀湘的第九兵團司令部。最初與衛立煌失去聯絡的就是廖耀湘這張王牌。各軍師之間也失掉連絡。衛立煌急電北平請示蔣總統，又奉令固師守瀋陽。此時林彪摸準國軍後路，退出新立屯彰武的共軍，急速南下，佔領了新民，東西包攻，國軍十二個師全軍覆沒，有六師長被俘，廖耀湘下落不明，跑回瀋陽的有新一軍長潘裕昆，八十三軍長龍天武。其餘的七十一軍長向鳳武，四十九軍長鄭庭笈，第六軍長羅文倫全無消息。黑山一戰，東北大勢已去，林彪又調動五六個縱隊，自十月廿五日開始向瀋陽外圍壓縮，担任城守的周福成五十三軍（周係東北軍），比廖耀湘腐化的更早。周福成身兼松江主席，第八兵團司令官，五十三軍長，惟恐官職太小錢太少，故專造個人勢力。部下師團長吸食鴉片，作生意，烏煙瘴氣。眼看林彪要打來，周的副軍長趙鎮藩，師長王立環首先搖動，採不抵抗主義，一路向瀋陽城邊退。瀋陽城內的守備隊梁祥徵，國軍部軍法總監趙毅，剿總高參邱立亭等幾位東北籍的失意軍官，見機與周福成的趙副軍長勾結，同時在去年被共軍俘擄又釋放的抗日名將蘇炳文，在瀋陽剿總任總參議，利用機會，聯合秦

（下接第七頁）

在牢獄中

昶明

親愛的大哥：

一共寫過三封信給你，未必都能收到。這些天來，外面的消息封鎖得很凶，片紙隻字都帶不進來，非常寂寞。不但不許接見親友，連通信的權利也都被剝削了，想必大局又緊張不少了吧！前兩天，隱隱聽到牆外賣報童子嚷着反攻濟南，我的猜想也許沒有錯。當局把我們當作了不得的所謂「匪諜」，於是軍事每失利一次，我們便被束縛得更緊一些，眞是寃枉透了無辜的一羣啊！

我們失去了自由，不知不覺快兩個月了。兩個月的時間，回想一想，長得靜得多麼可怕啊！假使在兩個月前，讓我預先知道我會在這麼一間斗大見方的小屋子裏至少要過兩個月，那我當時也許就會自殺，或者至少會害怕得神經錯亂。哥哥，你不知道寂寞的滋味是多麼難受呀！沒有書看是何等的苦惱！一屋雖有八個人，但可談的話早都談盡了。——而且是那麼輕聲細語的談着呢——每天每天，日裏夜裏擠在一塊兒，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各人的心情雖有不同，而每人的希望則完全一樣，只望跳出這間屋子；那怕做一輩子街頭要飯的叫花子，也心甘情願。我個人尤其寃枉。從幾千里外的故鄉，犧牲江南避暑的清福，誠心誠意地趕回校投案，爲的是不甘蒙此不白之寃，而結果這個光明的行爲竟換得黑暗的報酬。從前聽說特刑庭是相當賢明的，不料所謂賢明不賢明，純在犯人的運氣。我記得第一天訓導處一位職員送我到庭時，公事送進去之後，呆了好半天也不見響動，原來法官老爺們還未上班。那位訓導員等得急了，才有一位彷彿書記官什麼的出來叫他先回校，而我一直等到天黑，便糊裏糊塗被送進看守所。一直到一個多星期之後，才過了一堂。東問一句，西問一句，且是用誘供的方式，連問的人自已也有點莫名其妙了。我記不清憲法上關於拘束人身自由的法定時間規定，但照人情來說，把一個自行投案的所謂「嫌疑犯」，不聞不問，先關他一個星期再說，怎麼也想不出它的可能說出的理由。

大哥，兩個月來，你們該不知如何的掛念着我，不知如何的東托人西托人在想法營救我。我知道，大嫂天不亮就得起來，不顧孩子哭鬧，來忙着替我做飯。年老多病的母親，捨不得車錢，又捨不得兒子，每天來回奔波，爲我送飯送菜。連小姪女都會怪我不回家教她唱「古怪歌」了。而你呢，家庭負擔已夠你忍受了，如今還要爲你的弟弟忍受精神與物質的損失，忍受別人的譏笑。你會偷偷的背着母親揩淚的。還有看我長大的姑媽，她老人家失眠的病當更利害了，這是我有罪於家庭，對不住所有關心我愛護我的親戚朋友們。可是所可告慰者，坦白自問，毫無愧於國家民族，無愧於個人人格。我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我眼中從來不看重一文錢——所謂職業學生，當然應該有報酬的——，有的，只是強烈的正義感。也就是因爲這點正義感，平時冒犯了好多人。這兩個月來我嚐盡苦威武不能屈的正義的體驗。清白之身，自當不允誣蔑，小人雖存心洩仇誣告，但無證據無事實，在今日，莫須有的冤獄或許可能不會成立的。所以希望你們千萬放心。

你知道，我雖然讀的是電機工程，但對文藝却相當愛好。一般講文藝理論的人，都忘不了生活體驗所給予作品的重大影響。我何幸親身實踐人人所不得的囚犯生活。我們一室共有八個人，八個人中五個是所謂「職業學生」，兩個是經濟犯，一個是小偷。彼此本來不認識，可是自第一天開始認識後，便彼此認識得非常清楚。我們像是一家的同胞弟兄，朝夕相聚，居同室，寢同床，食同桌，拉同樣，決不像世間有些弟兄那樣仇敵相視。在這裏面，我發現人類最可珍貴的同情和友愛。誰說人類是殘酷的？這兒可沒有自相殘殺的現象，反之，却十足貫徹互助的精神。監獄本來是爲犯人而設的，照理說，犯罪的人，都應該是窮凶極惡或者至少也是存心不良的人類中的敗類；而實際上無其數的敗類並不被關在監獄裏。這房裏另外七個人，除了那四個學生，他們在校的成績都是相當優秀而外，那兩個所謂經濟犯，一個是「高抬物價」的攤販，一個是一位東北學生初到此地，因爲沒有錢，在街上賣了幾塊洋錢被捕（這個人前天被罰一百金圓才許保出）。至於那個小偷，本是一個電料行的工人，手藝相當好，但電料行倒閉了，他失了業，又不能不吃飯，於是偶而一次竊取街上的路燈電線。他根本不知道世上有所謂「主義」，更談不到什麼黨派，然而他被認爲是通匪犯人了。這些人，連我在內，要說存心「作亂」，「危害國家」，眞是上帝有知，也當笑死氣死！

這裏分甲乙丙三所，我住在甲所第××號室。聽說甲所內部比較舒服，而對外則比較嚴格。所以住甲所的犯人，要想在家裏送飯菜的條子上批註個把字比較困難。能不需就不寫，省得讓看守先生們不高興，給塗了之後，還大聲申斥一下洩忿。——我知道，在這個年頭，當一名看守，待遇有限得可憐，也就夠他自已生氣了。——一日兩頓飯都是玉米屑做的窩頭，（是囚犯自已磨的，篩過後，細的孝敬所內辦事官員，渣子則給犯人吃，聽說目前，像這種囚糧也難維持多久了。）一塊寸方小疙瘩，喝的水是蒸饅頭的水，每天二次，每次每人一小盃。有家在此地的人，送來的菜和飯，都是公開大家吃，讓沒有家的難友也分沾一點家庭的溫暖。上上個禮拜還有人替我在附近小館包了半個多月伙食，（每天送兩碗麵條），前天已停止，大約包不起了。這當然是幾個同學們幹的事，只好將來再表達我的感謝了。有一個學校每天送大批的饅頭給該校同學，聽說那是學生膳團特爲他們節省下來的伙食，可珍貴的友誼啊！

房子小，人又多，空氣光線都不好，所以每天早上六點半鐘「放封」的五分鐘，無論如何寒冷，沒有一個不願出去透空氣的。（有少數的學生還穿着單衣呢，）這五分鐘，在同一所的難友，都可以見面，因此認識好多朋友，彼此利用這緊緊的時間，交換所想到所猜到所聽到的消息。（出去開庭一次多少可以聽點零碎的消息），大家還沒有說完一半所要說的話，時間便到了，一個個像蜜蜂一樣紛紛歸巢，不敢多停一分鐘，因爲有那些「狗」在看着呀！有時我們高興的合唱着「團結就是力量」，唱着「大家唱」，我們把「大姑娘來呀唱呀」底下加上「看守們來呀唱呀，難友們來呀唱呀」，遇到好說話的看守，只好望着嘆氣。因爲「放封」的時間太短，所以每天關於倒馬桶的工作，各房間的難友差不多都是當仁不讓，搶着去做，因爲倒一次馬桶多少總多吸到一點戶外的空氣，雖然一不小心會把臭氣吸進一大口去。

這裏犯人都是剃光頭，但學生則通融保留原狀。剃光頭不花錢，長髮是需要理髮師來辦。我到這裏兩個月，始終沒有理髮師來過，據說是怕晦氣。當然，誰肯進牢門呢！我們的理想是，最好能有一兩個理髮師犯了危害國家罪被捕進來，這樣便可一舉兩得了。我現在鬍子相當長，我打算爲紀念這一段生活起見，從此便留起鬍子，回到學校，倒可以冒充教授，嚇唬嚇唬小徐她們。

今天雙十節，是您的壽日。我想到去年你曾說過打算刻一方圖章，文曰「我與中華同壽」，可是並未見你刻。現在我想起來，還是改做「中華與我同壽」來得口氣大些。好在同壽不致於犯危害國家的大罪，你還是刻一個吧！今天未見家裏送壽麵來，想來你的興緻一定被弟弟的事擾得一落千丈了。但我在牢裏，却仍然有興緻爲大哥祝壽。同學送了許多水菓來，我分饗難友，說是壽菓。啊，記起來了，請你打個電話給老曹他們，告訴他們不必送東西來，教我怪不安的。尤其不要來信。因爲信件不但檢查，多半送不到，而且還記下姓名地址，何必多此一舉呢！就拿送飯來說吧，無論饅頭燒餅都給撕個稀爛，帶餡的包子餃子根本不許送，大概是怕有毒自殺吧！他們把我們的性命看得也太不値錢了。

寫得不少了。在這一小塊光線之下，伏在炕上寫這麼一大篇，幾個難友爲了讓給我光線和地盤，不惜站起來等着我。最困難的是筆，（紙是擦屁股省下來的）這支鉛筆頭不到一寸長，不知是哪位前任難友遺留下來的，用它來勉強寫信，眞有「蜀中無大將」的味道。

這封信不定哪一天才能遇到難友出去開庭之便捎出去偷偷寄發，又沒有郵票。如果能平安到達的話，望在送來的菜裏面加一隻松花蛋來表示好了。

最後我說起哥哥的話：「暴風雨的時代就要來了，也許已經開始了。在暴風雨中，我們可能被淋得抬不起頭來，但我們自信是不會跌倒的。我們不光是等着光明到來，而是在暴風雨的打擊中，更加堅強我們的意志。我們決不消極，前進前進走向光明的大道……」

大哥，你該放心在艱難中的你的弟弟了吧！祝

大家都好。

你的弟弟明上

雙十節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二五五二號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illegible]

訂閱價目
一次先收金圓三十元，照售價七五折記賬，款盡通知續定

觀察航空版
華北航空版發行所：北平府右街李閣老胡同二號
台灣航空版發行所：台北館前路八十五號

（華北航空版每冊售二元五角）
（台灣版每冊售台幣 1500 元）

本埠分銷處
五洲書報社